

# 哲学与政治：1931—1949年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嬗变

殷如筠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初,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走在了一条社会哲学的道路上, 社会哲学通过对个体经验存在与社会整体结构之间的中介——文化生活的考察, 发现社会中主体性成分在急遽衰落, 权威主义人格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确证的关系。同时, 在国家干预手段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形势下, 批判理论认为权力动机取代了利润动机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力量, 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被技术和管理问题所替代,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还有着更遥远的未来。以《启蒙辩证法》为标志, 批判理论已经越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表现出对变革的深刻怀疑, 它摆脱了黑格尔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同一性还原主义传统, 转向对非同一性和否定性的深刻确证。尽管这种失去历史根基的批判几乎不可能被实现, 它仍保有一种理论乌托邦的希望。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 极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356(2019)-04-0076-07

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其对发达工业社会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批判, 对文学艺术的现代性研究,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等, 既根植于欧洲哲学的思辨传统, 又区别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唯心主义理性批判, 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的社会哲学的辩证批判。然而, 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却经历了“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的过程<sup>[1]</sup>。其中, 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为核心成员的社会研究所主导的早期批判理论最先开启了迥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重建的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处于一个后现代思想初现端倪的时期, 叔本华、尼采的意志论, 胡塞尔的现象学, 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思想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范围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意志、经验、主体、存在、直觉以取而代之之势大大动摇了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核心位置, 对理性主义的反思酝酿着

对形而上学的颠覆。于是, 这一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在反对海德格尔、反实证主义的哲学论争中强调对辩证法的运用, 坚信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性力量。另一方面, 他们也创造性地对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等现代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整合的研究, 其总的理论轨迹甚至被纳入了后现代理论转折的脉络中。与此同时,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还处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中。德国法西斯掌权, 极权主义和反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强力形式出现, 而社会主义运动却面临着失败和内部分裂的危险。从1931年霍克海默就职社会研究所所长, 到因纳粹的迫害流亡美国, 直至40年代末回归德国, 这段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在“水土不服”的美国学术环境中开展了诸多针对极权主义、反犹主义的研究, 一方面为反法西斯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另一方面学派内的主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经历了显著的嬗变过程, 直至开启了针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序幕。其中, 从“跨学科的唯物主义”到“启蒙辩证法”——这两个最

收稿日期: 2018-07-27

作者简介: 殷如筠(1992-), 女, 安徽合肥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艺理论。

网络出版时间: 2018-10-31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96.G4.20181031.0926.001.html>

具代表性的思想成果之间发生的理论嬗变显示出了法兰克福学派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的适应性和批判性。

## 一、跨学科的唯物主义：对权威主义社会基础的考察

社会研究所早期在格律恩堡的领导下，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为指导，注重经济学历史学派传统和工人运动史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霍克海默在1931年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后，改变了格律恩堡“重史轻论”的定位。

与马克思相同，霍克海默相信哲学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自身的真理性。但他处在一个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地被预先阻止的时代环境中，而当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由于受到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历史唯物主义片面地解读为机械决定论。面对实证主义对实践的“滥用”和存在主义等非理性思潮对形而上学的冲击，内外交织的危机中重建一个非唯心主义的、真正科学的理论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在霍克海默看来，与社会科学联合，进行跨学科的唯物主义研究是应对当下哲学危机的唯一办法——既然哲学不能被“实现”，就必须将其转化为某种“中介物”，以避免哲学退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这一“中介”就是社会哲学<sup>[250]</sup>。

霍克海默在其就职演说《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中提出，社会哲学是解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理论构想与个人经验如何能够相互渗透”的哲学。他认为，黑格尔之前的形而上学是一个逻辑抽象的理论王国，思想对它的对象并不关心。而实证主义则用分析科学的手段确定事实，把科学的普遍性局限于表面现实的统一之上，它忽略了历史发展的问题，极易成为体制的同谋、权力的工具。当下德国对这两种倾向的反驳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海德格尔将“个体的生存”看作唯一的真实存在，霍克海默认为这是对社会哲学彻底的否定。他追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即只有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整体中，个人存在的意义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因此，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对并非仅仅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sup>[3]</sup>在整体中理解个体，在经验中追溯理论，将哲学普遍的、本质的问题取向融入经验科学的具体研究中，建构关于哲学结构与社会学说中的经验并存的有计划研究，被视为社会研究所应对当下哲学危机、实现精神与现实的融合的必然选择。

这次将哲学与社会学科结合的理论框架的构建，成了批判理论的开端。研究所于1932年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作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的阵地，并于同年开展了德国工人阶级研究，首次尝试将批判理论运用到具体经验问题上。

社会研究所对德国工人阶级进行研究的最初目的是考察工人阶级结构。在1932年处于经济危机中的魏玛共和国，某些地区失业率达到50%，总失业人数高达600万人<sup>[4]</sup>。法西斯分子已经蠢蠢欲动，而左派政党却在政治斗争中陷于低潮，工人阶级与其政党的关系不够紧密，表面看来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但社会研究所基于对工人运动史的长期研究，敏感地察觉到工人阶级状况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终结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依赖于某个特殊阶级的革命来实现。其时，德国的工人阶级中白领工人增长迅速，蓝领工人占比却在持续下降。而白领工人往往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保持着舆论认同，越来越不大可能接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们无法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作新经济秩序的代理人。霍克海默认为“他们是他们监禁者的拙劣模仿者”，被限制在虚假的思想精神状况中。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这次研究计划的主要起草者弗洛姆(Erich Fromm)收集了工人对儿童教育、工业理性化、避免战争可能性等一系列问题的意见。结果证明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仰和人格特性之间有明显差异，“左倾”的政治态度只是为工人提供满足的各种形式之一，而他们“对右翼夺权的抵制之轻微与其激进的意识形态不相配”<sup>[5138]</sup>。工人阶级在一战后抱有的社会主义希望经历了一连串失败，因此虽然客观上仍是各党的成员，宣扬信奉其政治信条，但内心陷入了对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价值的怀疑中，其厌倦和屈从的状态代表了整个纳粹崛起阶段民主国家里个体的普遍状况——这一结论成为二战结束前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国家社会心理状况的基本判断。

这次研究的成果最终未能发表，但其发展出来的方法工具以及分析结论被运用到了研究所流亡美国后发表的首份报告《权威与家庭研究》(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1936)中。《权威与家庭研究》的目标被定位为解释以下问题：“不同性格的人对国家权威和社会权威的不同态度、经济危机造成的家庭权威衰落的表现形式、更强的或更柔和的家庭权威状况及其后果、多数公众对教育目的的认识以及其他类似问题。”<sup>[613]</sup>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为这份报告撰写了对

资产阶级权威结构进行分析的论文。霍克海默指出,在资产阶级鼎盛时期父亲因其经济地位在家庭中具有权威,社会因父权制教育而“生机勃勃”,但进入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打击使得父权客观的权威地位处于瓦解中,家庭反抗社会的作用在衰落,社会更加直接地对个体产生控制,政治权威主义因此而获得了发展的土壤。

将研究对象从工人阶级转向家庭结构,体现了霍克海默领导下的法兰克福学派突破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努力。由于马克思没有对文化进行具体的考察,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片面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取向,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被机械理解,不仅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文化,也缺少对文化的社会系统和心理基础的中介性的考察。而霍克海默则认为,“不仅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哲学内部,而且在社会学以及在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圈子中,围绕社会的讨论逐渐集中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即是有关社会经济生活、个人心理发展和狭义的文化领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sup>[112]</sup>他明确将“个人心理发展”视为与经济基础、文化上层建筑同等重要的考察对象,是由于他认为“社会特定成员由于他们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中的境况,发展出一套心理构制……该心理构制反过来又使整个体制的系统得到维护和发展。”<sup>[176]</sup>通过分析个体心理是如何服从于社会所要求的行为结构来阐释其与社会系统的辩证关系,并将其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成为唯物主义的心理学<sup>[818]</sup>。除了霍克海默,弗洛姆和阿多诺等人也积极从事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的研究,社会心理学阐释模式成为社会研究所跨学科唯物主义研究框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方法,成功突破了“经济决定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阐释。

## 二、政治优先性：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

霍克海默就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不赞成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立场,但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关注从未减弱,《社会研究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了经济理论的文章,在对法西斯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中,经济学阐释模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丁·杰就指出,“批判理论新的基础在其认为:经济的作用在20世纪已发生重要变化。事实上,研究所关于法西斯本质问题的争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变化的特性上。”<sup>[5176]</sup>然而针对这一变化的特性,

研究所成员的观点却有很大分歧,这也成了学派的主流理论发生转折、非核心成员与研究所加剧分裂的先声。

早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后,社会研究所内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其他持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抱有一种乐观的希望,认为经济危机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机遇,资本主义行将崩溃。与此同时,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却在1929年撰写报告《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验(1917—1927)》,明确表示苏联不具备由国家接管市场的高水平的经济物质条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未取得成功,其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体制。1932年波洛克又发表《资本主义的现状与计划经济新秩序的远景》一文,讨论了资本主义达到长期稳定的可能性前景,在波洛克看来,当自由市场经济遭遇到瓶颈时,资本主义在生产管理和技术手段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具备了使用计划经济手段转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政府干预的经济计划可以通过“对生产力强行缩小”等整体调节来缓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这将有效地甚至是无限期地控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当波洛克在1941年发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制度吗?》《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和限度》两篇文章中将他的观点扩展为有关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时,在研究所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其时,德国经济在纳粹使用多种国家干预的手段下,显示出令人惊异的活力,失业率降低,企业利润增长,大大消除经济危机对德国的影响。波洛克将其视之作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国家资本主义,虽然是以稀缺经济即战争或备战为前提,但未必只是一种过渡的形态,相反,它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基本常态。他总结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个特征:“私有资本主义的后继者,国家承担私有资本的功能,利润利益仍发挥作用,不是社会主义。”<sup>[972]</sup>作为一种新社会秩序的国家资本主义,动用行政管理的权力取代了单纯以市场进行调节的模式,生产、消费、价格、投资等等都被纳入了国家的总体规划,个人和集团的利润利益从属于国家的需要。在经济学家原先绞尽脑汁地解决交换过程之谜的地方,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他需要解决的只是纯粹的管理问题。”<sup>[987]</sup>通过科学管理的手段,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特性已经让位于统治集团的权力工具,“权力动机”取代了“利润动机”。

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美国新政,波洛克最后断定人们面临着极权制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制

国家资本主义的选择,并对后者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认为其可能在解决了市场经济缺陷的同时保留了民主和自由,而“国家资本主义通往民主体制的主要阻碍来自于政治的本性,且只能通过政治手段来克服。”<sup>[9]93</sup>波洛克这种明显背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论的观点在当时遭到诺伊曼、洛文塔尔和阿多诺颇为严厉的批评,阿多诺在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说此文“相当一部分来自一种非辩证的假设:在充满对抗的社会中有可能存在一种无对抗的经济方式”<sup>[6]379</sup>。

与其他成员不同,霍克海默同意国家资本主义是继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新阶段的观点,并且明显受到波洛克“政治优先”思想的影响,这与他长期致力于研究权威主义有很大关系。有关权威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了在社会总体制度的影响下,个体与社会系统呈现出了辩证的关联,即使是工人阶级的人格结构,也无法在抗争的过程中摆脱权威主义的影响。其阶级意识和政治积极性远不如马克思主义者预想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在《权威主义国家》(1940)这篇文章中,霍克海默的“整体国家主义(Integral Statism)”概念比“国家资本主义”更加强调政治权力和官僚系统对个体的影响。他指出,官僚系统已经控制了经济运行机制,而后者已经脱离了资产阶级的纯粹利润原则。不仅如此,统治者因技术力量的增强而得以更稳固地维护其制度体系,赤裸裸的权力成为唯一的正义。无产阶级则在科学管理的手段下对权威主义国家保持被动的支持,“相比劳动,他们更依赖于从机构中获取保障和援助。”<sup>[9]98</sup>无产阶级政党对统治者的威胁在霍克海默看来只是一种竞争关系,后者并不会动摇权威主义国家体制本身,相反,“当反对派获得了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他们自身会成为新的官僚系统”<sup>[9]99</sup>。事实上,霍克海默将苏联和法西斯主义国家一起视为是权威主义国家形式,虽然恩格斯曾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一样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而非过渡的组织形式,有可能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秩序而取代社会主义。霍克海默对社会主义前景的悲观论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无法摆脱对技术理性的依赖的判断,而技术理性是权威主义国家官僚体系最强有力的基础。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挣脱了国家资本主义锻造的、社会主义使其永存的技术束缚后才有可能实现。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在40年代初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理论转折,无论是波洛克还是霍克海默,他

们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法西斯主义的范畴,形成了有关资本主义的新的基础理论,政治权力、官僚体系及其所依赖的技术理性成为新的理论核心,社会主义的未来被悬置在怀疑中。他们对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将持久存在的预言极大地影响了后续批判理论的研究方向,因为它不仅假定了资本主义的总体统治,还看到了这种统治向社会其他领域延伸的倾向,而这种延伸的新形式,就成了其后批判理论转向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研究的合理性基础。

### 三、诺伊曼的《巨兽》与重建德国民主政治的实践

40年代前后作为社会研究所酝酿转折的时期,内部成员也发生了较大变动。弗洛姆在1939年与研究所在断绝了关系,格罗斯曼也因其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研究所在渐行渐远。除霍克海默核心圈子以外的人如诺伊曼、马尔库塞、基希海默等都被鼓励接受美国政府的聘用以脱离研究所的资助。其中,弗朗茨·诺伊曼(Franz L. Neumann)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研究所在美国发展的最好的成员,但由于他的研究方法和立场与其他成员有分歧,一直没能进入到研究所的核心圈子中。在霍克海默与波洛克都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未来路径时,诺伊曼却鲜明地站在了反对立场。他在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说道:“在波洛克看来,世界经济总的发展趋势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增长和不断强化,并且,国家资本主义似乎可以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今天的剥削者明天可能就是救世主,这种论调实在令人绝望……它明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sup>[6]383</sup>但霍克海默并不认可他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波洛克的激烈批评。于是,1942年,出于和研究所分道扬镳的打算,诺伊曼撰写了《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一书。

《巨兽》的书名“狻希莫斯(Behemoth)”指的是犹太教神话传说中的巨大陆上怪兽,诺伊曼用来指代实行恐怖统治的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对极权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的阐述构成了《巨兽》的核心:“今天的德国经济有两个广泛的、显著的特性,它是垄断经济,也是一种指令经济,它是由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私有资本主义经济,我们建议最好称之为‘极权制垄断资本主义’。”<sup>[10]261</sup>诺伊曼从更为正统的经济分析立场出发来讨论法西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调和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不能和私有资本主义相适应。在考

察了德国的经济状况后,他提出魏玛时期大资产阶级的垄断活动已经造成了德国经济体系僵化、失业率上升等问题,但纳粹并未限制垄断经济的发展,相反强化了垄断的地位从而促成商业活动被合并为极权制下的工业组织网络。尽管纳粹不能被简单判定为垄断经济的产物,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权力支撑,政治权力在纳粹德国所达到的极权阶段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和垄断经济在德国帝国主义扩张的方向上是一种共谋的关系。诺伊曼在《巨兽》中说道:“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表明正是利润动机才使各种机构联合在一起,但在垄断体制中,没有权威的政治权力就不能产生和得到利润,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与众不同的特征。”<sup>[10]354</sup>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在危机时期和战争时期对企业进行管控,到了经济复苏时期又会进入“再私有化”阶段。纳粹当局也是如此,特别是1936和1937年,为弥补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收入,再私有化进程达到了顶峰<sup>[11]</sup>。即使是国家管控阶段,大资本也在德国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诺伊曼力图表明,纳粹德国垄断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模糊了二者背后经济基础的差异,他既没有提供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说明,也没有对德国现实状况的经验性考察,是缺乏理论依据的盲目判断。虽然诺伊曼的《巨兽》基于对德国经济的实际考察,具有更扎实的经验依据,并没有能扭转批判理论对经验主义日益怀疑、走向历史哲学的方向。

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时期,出于寄人篱下的谨慎心理,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态度是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回避马克思主义立场,甚至对《社会研究杂志》进行自我审查,避免与激进政治活动有关联。然而以诺伊曼为代表的部分研究所非主流成员却在美国政府机构中积极参与政治实践。1943年,诺伊曼进入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研究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的中欧分部工作,基希海默和马尔库塞也与其后两年分别加入,为美国当局撰写分析德国法西斯的报告。他们的报告内容主要涉及反犹主义、纳粹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公诉战犯等问题,在帮助美国当局摆脱对德国的陈旧认识、把握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特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阐述了大量有关如何重建战后德国的民主秩序的问题,并试图引导美国当局在战后德国做出有利于左派反对党的决策。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纳粹主义经济问题,

诺伊曼团队在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尾声时,曾对美国财长摩根索废除德国现代工业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这对杜鲁门最终放弃该计划起了很大作用。诺伊曼认为通过废除现代工业来清除纳粹残余有可能引发德国内部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混乱局面,同时也不利于战后欧洲经济的整体恢复。基希海默也表示应该用渐进的制度重建恢复德国的民主和自由,接管重要的物资、工业、交通管理机构<sup>[12]13</sup>。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提出,战后的去纳粹化过程应重视纳粹主义的经济基础,其中包括一些看似中立的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应该和一些活跃的纳粹分子一起被置于监控和代管之下。

研究所成员还致力于在报告中强调左翼反对派对于重建德国民主政治的重要性。马尔库塞提出要想在德国肃清纳粹主义,扶植德国本土的反对派团体是最有效的方法:“鉴于共产主义者在纳粹统治期间长期进行有组织的地下反抗活动,它们能够就分辨隐蔽的纳粹分子和纳粹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sup>[12]299</sup>“只有在美国辅助下的本土的地下反抗活动才能将非政治化的共同体的一致性转变为政治上的团结,而地下反抗活动本身更是转变德国民众消沉、冷漠和憎恨状态的希望。”<sup>[12]105</sup>诺伊曼甚至建议,一个稳定的军事政府只能依赖于融合英美民主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改革理念,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是纳粹主义的主要根源,德国民主的振兴依赖于对国家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修正。

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研究所成员在影响美国当局在战后德国的民主重建政策上没有成功,许多带有鲜明左派色彩的意见显然未被接受,战后的德国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的关键位置仍然由原来的大资本家占据。相比诺伊曼他们提供的支持工人阶级以及左翼力量来重建民主秩序,美国当局更倾向于建立与教会团体的关系,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能满足当局想要稳定中欧社会,防止社会革命和新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出现。

#### 四、启蒙辩证法:走向理性批判

在诺伊曼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重建德国民主过程中的影响而埋首于给美国当局的报告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已经逐渐转向了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这种超越除了建立在对极权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之上,与学派一直以来对实证主义的抨击也有重要关联。自流亡美国后,社会研究所出于适应美国学术环境的需要和社会哲学跨学科综合的思

路,曾努力将经验研究方法与批判理论相结合,然而在40年代初,他们对这种结合的可行性日益产生怀疑,这一怀疑在反犹主义研究时期尤为明显。

1943年,社会研究所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资助下开展“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研究被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极权主义类型及其政治作用”和“心理学研究”。但霍克海默担心AJC不重视纯理论的重要性,他对在纯粹心理学框架下进行研究持怀疑的态度,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写道:“在计划书中我使用的心理学这个词其实是指人类学……对支配图式在人的思想中、在其本能中,甚至在哲学生活中的呈现进行研究才是我的意图所在。”<sup>[64]</sup>然而,霍克海默同时明白,AJC关心的是如何改善在美犹太人的待遇,这项研究计划的最终意义只能在于给反犹主义的反民主根源提供“科学证明”,因此采用“传统的美国方式”来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他们不得不减少批判理论的分量,更多地使用经验主义方法。1950年,代表此次研究成果的几卷《偏见研究》出版完成。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尽力适应经验主义方法,但霍克海默很快就意识到,批判理论自身的理路很难从中发展出来。美国的经验研究方法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倾向于认可经验现实的合理性并沉迷于记录经验现实的变化,将真理与实践价值等同起来。对此,斯坦利·阿罗洛维茨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核心的对实证主义的抨击,对批判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来说,一直是最困难,而且也是最关键的。”<sup>[76]</sup>批判理论依赖于认识论上的客观真理的承诺,其辩证法的基础在于承认概念和存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且永不停息地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但对实证主义来说,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存在分离的问题,客体被归结在工具价值中,是人的行为实践中被操作的对象。因此,实证主义既是反辩证法也是反历史的,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带来了“同一性”的危险,它缺乏黑格尔辩证法所说的对“确定性的否定”,是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理性被湮没后发展出的主观理性的体现。正是这种虚假的欺骗性质的理性,成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作完成的《启蒙辩证法》(1947)所批判的对象,这部著作基于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探讨了“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的症结所在。

所谓启蒙,是以知识的理性替代了神话的幻想,让人从野蛮和蒙昧的状态中觉醒,脱离造物主的奴仆的身份,成为自然(社会)的主人。如康德

所说,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而《启蒙辩证法》认为,人们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将自然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导向的是主体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分裂。这种分裂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旦人们不再意识到其本身就是自然,那么,他维持自身生命的所有目的,包括社会的进步、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增强,一句话,就是其自我意识本身就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手段变成了目的”<sup>[134]</sup>。手段变成了目的,也即工具理性获得了独立性,那么任何存在都能从制造和管理的角度去理解,事物在神话时代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被实用科学规制为理性的同一性,这种规制最终延伸到了主体自身——人对自然(客体)的工具性操纵同样作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启蒙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即“神控制世界的宗教信仰的世俗化版本”。因此,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极权主义不是对启蒙理性的否定,而是其内在动力的发展。启蒙制造出的“工具理性”的神话,已将个体变为政治和经济管理体系中日益“原子化”的、孤立的存在,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压抑统治的基础。

在精神领域,如果说神话将客体精神化,工具理性则是将精神客体化了,《启蒙辩证法》强调,“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灭亡。”<sup>[134]</sup>有基于此,阿多诺所研究的大众文化的媚俗化统治才得以在现代社会发生。不仅如此,启蒙理性最具控制性力量的一点是把真理与科学体系等同起来,以直接性代替辩证,其创造出的“同一性”在精神领域的表现是对否定性的清除,而否定性——在批判理论看来——对历史发展的动态可能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启蒙辩证法》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启蒙传统中,以一种新的历史动力来替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矛盾”,焦点是人与其内外自然的更大范围的矛盾。随着这一转变,历史主体引导革命时代的可能性也消失了。自此,理论自身而非革命实践成为批判理论一种带有乌托邦的希望,正如霍克海默在《权威主义国家》中预示的那样:“理论是这样一种不同的存在:它拒绝成为某种可寄托希望的知识,它面向的是永远确切地包含着可能性的历史。”<sup>[19106]</sup>

## 五、结语

马克思曾预言过思辨哲学的终结,但批判理论

走向了这一观念的反面。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在努力防止哲学堕落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证的社会科学——既然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任何实现哲学承诺的尝试必将陷入工具化的结局。通过坚持辩证法作为始终如一的非同一性的、否定的意识,哲学在批判理论中承担了与革命性构想一致的社会功能,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可以说,批判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却最终在其缺失的环节上生根发芽。它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主义威胁,其文化理论拯救了被经济主义捆绑的唯物主义文化批评。然而,正如霍克海默所说,批判理论的激进化增加了它和激进实践的距离。从《启蒙辩证法》开始,社会主义也被视为启蒙理性倒退中的一员,它把必然性抬高到未来的基础地位,又从批判唯心主义的角度贬损了精神,这样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的关系就只有量化和机械的意义了。经历了理论嬗变之后,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不再是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实践,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阻止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物化”,统治集团的更替改变不了政治权力的总体性力量,革命的阶级意识也无力对抗大众文化对自由的腐蚀。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彻底的——它放弃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经济基础作为社会分析的中心,放弃了唯物主义,最终想要通过历史哲学的辩证认识寻求真正“理性”的回归。关于解放的乌托邦被批判理论寄托在哲学而非政治层面,理论成了唯一的实践形式,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条

没有终点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 王凤才. 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上)——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06): 93-101.
- [2] Edited by Seyla Benhabib, Wolfgang Bonss, and John McCole. On Max Horkheimer: new perspectives[M]. London: MIT Press, 1993.
- [3] 霍克海默. 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J]. 王凤才, 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05): 123-129.
- [4] 恩佐·克罗迪. 希特勒与纳粹主义[M]. 文心,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5] 马丁·杰. 法兰克福学派史[M]. 单世联,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6] 罗尔夫·魏格豪斯. 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M].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7]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李小兵, 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8] 蒋颖. 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 霍克海默早期文化批判理论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16(1): 15-20.
- [9] Edited by Andrew Arato, Eike Gebhardt.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M].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 [10] Franz. L.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 [11] 夏尔·贝特兰. 纳粹德国经济史[M]. 刘法智, 杨燕怡,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年.
- [12] Raffaele Laudani. Secret Reports on Nazi Germany: The Frankfurt School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3]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from 1931 to 1949

YIN Ru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was on the path of social philosophy. As the medium between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society, the main object of social philosophy is the cultural life of human beings. The Frankfurt school discover that the subjectivity is declining rapidly. There is a mutual confi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political interventions hav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capitalist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Critical Theory holds that power motives have replaced profit motives as the dominant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capitalism. Economic issues have been replaced by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issues. Capitalist democracy has a more distant future. Marked by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Critical Theory has gone beyond the Marxism, showing profound doubts about socialist revolution. It breaks away from the identity reductionist tradition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in Hegel's dialectics and turns to the profound confirmation of Non-Identity and negation. Although this kind of discredited criticism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realize, it still holds the promise of a theoretical utopia.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totalitarianism